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史实辨析】	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	林蕴晖
【文革一幕】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郝怀明
【史实考证】	“北兵南调问题”考实	夏明星
【不堪回首】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丁学良
【史海钩沉】	周恩来对阎红彦之死的定性讲话	孙 陇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实辨析】

毛泽东为什么派彭德怀去三线

• 林蕴晖 •

1965年9月，中央决定分配彭德怀到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据说，毛泽东当时曾亲自召见彭德怀，谈话中还说了一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自1978年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进行平反以后，就陆续流传开来。不少谈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关系的著述，都引用了这句话。曾经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回忆毛泽东的书中，甚至说这句话“说明主席也在反省自己的问题，而再一次请彭德怀出来工作，又反映了主席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相关的事实经过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似乎值得讨论。

问题还得从中央何以为彭德怀分配工作说起。

有著者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六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一直没有联系。可在1965年，彭德怀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了信，这一次是八万字。毛泽东的心里很不平静，加之要搞三线建设了，彭德怀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者，可以让他去领导三线建设”。

事实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是写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当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将彭德怀的上书判定为“翻案风”的代表作，说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决定成立审查彭德怀的中央专案委员会。可见，“八万言书”既不是写于1965年，更不可能是触动毛泽东要重新起用彭德怀的动因，相反的，“八万言书”倒使彭的冤案进一步升级了。

三线建设起因于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共中央于当年4月12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正是在这个大背

景下，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

这么做，是不是与中央专案审查一事相矛盾呢？为了不致引起专案人员的误解，9月7日，康生在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时特别讲道：“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所以，中央安排彭德怀工作的同时，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很快就搞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

黄克诚当时就感觉到这件事有些不对头。他后来记述这件事时写道：“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毛主席来看我，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我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同时听说彭德怀也被派到四川，去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我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只要允许工作，干什么都是高兴的。他们要我快走，尽快离开北京。因国庆节将到，我问：可以过了节走么？答：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这样急使得我略感奇怪。”

在党内稍有工作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只有战争时期或遇有特殊紧急情况，组织上才会要求被分配工作的对象立即报到。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对于像黄克诚这样的老同志，根本不会如此要求。无怪乎黄克诚会“略感奇怪”，因为这根本就不像是一种正常的分配工作。

既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分配工作，而是有着特殊的原因和背景，那么毛泽东亲自接见彭德怀，并对他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很难让人理解。

其实，毛泽东接见彭德怀，也是有特殊原因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毛泽东发话让彭、黄、习去外地之后，负责彭德怀日常学习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于9月11日上午来到彭的住地吴家花园，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说中央有人要和他谈话。

他们随即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步入江苏厅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已等在那里。互相问好，漫谈数语后，彭真说明主旨：“今天我们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对此毫无准备，沉默片刻后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但没有解决问题。

事后，彭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谈话情况，贾震、乔明甫二人还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9月21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当天下午，彭德怀的信送到了毛的案头。毛看后决定23日亲自同彭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

可见，是由于彭德怀坚持己见，才引出了毛泽东亲自召见的情节，而这并非毛的本意。注意到毛泽东要彭德怀离京的初衷，和这次见面的背景，我们很难想象毛会说出“也许真理在你

那边”这种“反省”的话来。实际上，当时的谈话是否真像《彭德怀传》所绘声绘色地描写的那样，都有点让人怀疑。《彭德怀传》描述说，那天毛约彭8点半到，彭提前15分钟到达颐年堂，毛已站在门口等候，“和颜悦色”，“似生伤感”；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出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书中还有“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等语。这样细腻生动的描写，是否真的反映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当时对话的情况和心态，恐怕还要等更多的档案资料公布出来之后，读者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除了毛泽东原本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并无“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关的著作对毛、彭见面的情节描写太过文学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离京去三线的同时，正在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怀为靶子的。

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记载，从1965年初开始，江青就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执笔的这篇大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都是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央政治局也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而批《海瑞罢官》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断定有人想借这出历史剧替彭德怀翻案。

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彭德怀离京“赴任”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正式批准发表了姚文元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紧接着，12月21日，在全国范围内已熊熊燃起批“海瑞”烈火的情况下，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了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如此这般，有关毛泽东当年曾经“反省”过自己的问题，并因此向彭德怀表示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的说法，不是太值得怀疑了吗？

□ 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

## 【文革一幕】

###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 郝怀明 •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号召说：“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

一场新的批斗中宣部的“阎王”们的恶浪在全市以至全国掀起来了。

11月30日晚，中宣部文革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陶铸、陈伯达关于斗争陆定一的指示，讨论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大家认为，陆定一是最顽固、最凶恶、最反动的大阎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他在全党全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定要“积极组织这场大斗争，斗倒、斗垮、斗臭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会议决定由部文革委员会直接领导这场斗争，成立斗争陆定一工作小组，做具体组织工作。并根据陈伯达的批示，在斗争大会之前展出陆定一地主家庭罪恶史，“揭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的罪恶历史”。（参见中央宣部文

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简报》第114期，1966年12月5日）

中宣部在12月间连续召开的三次批斗陆定一的大会上，是把陆定一当作“地主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来胡批乱斗的。

◇ 陆定一：“我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12月9日晚，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全体同志举行“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陆定一”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以及从无锡市五一中学来京送抄家材料的红卫兵。

这次斗争大会，是他第一次被拉出来在如此广大的群众范围内公开批斗。接着，在10日晚、11日晚，又连续开了两次斗争大会，每次都长达四、五个小时。为安全起见，有两次批斗会是在部外军队的礼堂进行的。

第一次斗争陆定一大会，陶铸出席。大会主要揭发批判了陆定一三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一是说陆定一是“混入党内40年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分子”。主要根据是无锡五一中学红卫兵从陆定一无锡老家抄家抄出的一些材料，如祖上的画像、地契、分家时的字据等。在分家时，早已离家参加革命的他也曾分得一份田产、几千块银元，这样他就被诬为“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了。他在会上坦承，钱他是拿了，但都交给了党组织，作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经费使用了。

二是说“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夫妻黑店实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从会上揭发的情况来看，严慰冰对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妥的做法，陆定一并不知情，他听了大家揭批的一些事情后，左一个“道歉”，右一个“有罪”，倒也痛快，一条都没有反驳。

三是说陆定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说他从1954年起，就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猖狂攻击毛主席。他在1956年7月说：“看到苏联的例子，我感到官僚主义、思想僵化是最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在北京的人了解实际情况太少……而且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听到的是一片万岁声。这样就会闭塞起来，听不到批评的意见……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1956年11月20日至23日，他在15个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可以有斯大林独裁制，也可以有民主的办法。以为我们的社会中不能产生专制主义，不对。一旦产生以后，权力比秦始皇、希特勒的权力还大。”1958年3月20日，他在征求《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的意见座谈会上说：“斯大林在某些制度环节中出了毛病，所以生产下降。”1964年6月23日，他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的时候，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都不做独立的调查研究，没有独立的见解，只要会背斯大林如何讲就算。”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党如果没有群众路线，是要亡党的。”“党没有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但陆定一在会上拒不低头认罪。他的头被“造反派”摁下去，但只要对方稍一松手，他就昂起头高喊：“我不反对毛主席，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陶铸在大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说：“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的斗争，是一场十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21年，一贯是阳一面，阴一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党黑帮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罪大恶极。彻底揭发他们，彻底打倒他们，对我们的

党、我们的国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陶铸号召全体革命同志再接再厉，把斗争“大阎王”陆定一的仗打到底，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并警告陆“必须俯首认罪，彻底悔改，争取重新做人”，否则“是死路一条”。不知此时的陶铸对陆定一“现在是什么人”是否已经真的认识清楚了。但话说得够狠，够劲。那时，不论由哪个在台上的大人物来讲，大概都会是这一套。

陆定一对大会上对他的无理的批判极为气愤。10日上午，审查委员会逼他交待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问题，交待所谓“反对派”的名单。陆定一大怒，拍了桌子，提出抗议，怒斥这是对他搞“逼供信”，搞“左”的“扩大化”。他宣布从这天下午开始绝食。他给家人写下遗嘱，说：“我犯了很多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我不是反革命。”自己“死得冤枉”，“死不瞑目”。他坚信，自己的“冤枉总会昭雪”。这位年过花甲的硬汉，当晚拒绝进食。但中宣部批斗他的大会照样进行，他仍旧被押来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斗争大会。

这次大会着重批判了他四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 批陆定一反对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及允许有“反对派”、“党这些年来犯了‘左’的错误”

一是说他“一贯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陆定一早在1958年就攻击毛主席著作不是普遍真理，只是为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提供钥匙”。1959年1月，他不赞成北京大学学生要求联系实际进行哲学教学的意见，说“许多人连马克思主义都不看，只看《矛盾论》、《实践论》，这是不行的。不能要求学了哲学，马上就用，没有这样的事情。”1960年，他提出不要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反对毛著学习中“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形式主义”。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构成了中宣部天字第一号“滔天大罪”，涉及部里许多位部、处（局）领导同志，闻名全国。

说陆定一和中宣部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当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顶峰”时，陆定一说，这种话让后人去说，如果说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岂不等于说它再也不能前进、再也不能发展了吗？他对林彪搞的那个《毛主席语录》，宣扬的那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也觉得不大对头。他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应当学习它的精神实质，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去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背上几句毛主席语录，到处贴上个“毛泽东思想”的标签就是毛泽东思想了，问题就能解决了。他多次讲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把它当作偶像，不要把它看成包罗万象。毛主席没有研究过物理、化学，怎么能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物理、化学？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贴糟了，贴标签坏得很。贴标签，好像义和团差不多，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这一次乒乓球赛，星野到后来输得不得了，他想翻回来，头上扎了一块布，里边有个菩萨。现在把菩萨换成马克思在那里，行不行？这不是迷信吗？他不会救你的。不要贴毛泽东的标签，也不要贴马克思的标签。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多次讲过上述这样的意见和看法，部、处领导同志都非常赞成和同意。当时在社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风气很盛行，中宣部行使自己的职责，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以防止和克服毛著学习中的这种不良的倾向，力图扭转由于林彪倡导并得到毛泽东支持而风行的那种不良的学风。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央：

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现将我们最近检查的部分有关报刊书籍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

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

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同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书，选用了这篇文章。1958年8月“宣教动态”第九十一期，曾指出这篇文章是“客里空”的假报道，当时全国妇联也给各省、市委宣传部发了通知。1960年5月“内蒙古妇女”杂志刊登的“毛主席关于妇女运动的语录”，仍然摘录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去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的一篇“永远要做群众的小学生”一文又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当否，请予批示。

中央宣传部

1961年2月23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在这个报告上划了圈，并于3月15日以中央的名义转

发了这个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明确表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此件发至县团级。

可以看得清楚，这个文件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陆定一当然不是也不会反对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方法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反对“言必称希腊”的，现在的毛泽东却喜欢“言必称毛泽东”，林彪主张的那一套可谓“正合朕意”。当时，这个文件的确是对着林彪主张的那一套来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林彪为什么对陆定一那样切齿痛恨，毛泽东也非要把他打翻在地，把中宣部砸烂不可了。

二是说陆定一“是反对和限制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魁祸首”。基于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为保证质量而采取的措施，根本不是什么“罪行”，而且事情都是下面的同志操办的，现在要把账统统归到陆定一的头上，其罪名当然不能成立。

三是说陆定一“同赫鲁晓夫、彭真一唱一和，大反三面红旗，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说他攻击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精神”。“‘乱、糟、偏’，至少用一个‘乱’字。教育如此，别的也如此。”他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错误的，“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纠正起来花很大力气”。他说：“自留地是个好东西”。“现在都提出翻案，胡风提出翻案，农民提出土地回家等等，这不单是富裕中农主张，中农主张，我们党内也有人主张。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搞得没饭吃。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这无产阶级专政都得翻掉。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拉科西。”“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有一股风气，过渡到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少。客观地回顾我们过去的工作，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乱搞，只看到一面，没有看到第二面，理论水平是大问题。”“过去只讲成绩，不讲困难。这样情况再搞几年亡国就是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毛泽东语），这一个指头也真烂得差不多了，烂狠了也会死人！”“‘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长征时，最后，连电台都丢了，和第三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才开得成。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一步，要到东西都丢光了，才能觉悟过来。”“要告诉我们的党员和儿子、青年，要准备倒霉，准备没有裤子穿！路线错了，要倒霉！”他“大讲三次‘左’倾路线的‘教训’，大讲反‘左’比反右难，大讲所谓历代‘亡国’的‘教训’，等等。”他提出：“1958年以后，中央犯了些什么错误，向干部讲清楚，你不讲人家也会讲的。把文件翻出来，看看讲了些什么错误的东西，讲清楚吸取教训，是不是路线错误。”他认为，我们党这些年来犯了“左”的错误，建议中央应搞个反“左”的文件。

四是说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反对派”，“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大阴谋”。陆在这次大会文教小组会上有个发言，提出“党内不仅要有反对的人，还要有反对派”。“在桌面上做反对派是可以的，是好的。有时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唐太宗有一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作对立面的……反对派讲话，听起来味道不是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而是戴点帽子，打点棍子。”他还提出要实行“新经济政策”，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斗争会上不讲事实根据，胡乱上纲批判说，陆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提出这样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直接为“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鸣锣开道，就是反革命颠覆活动！”现在，世人皆知，民主的基本内容或原则之一就是允许“反对派”，陆定一主张应当允许有“反对派”并不是一件坏事。1956年6、7月，他在部分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自由这面旗帜完全拿到手”。他在部办公会议上说，我们的人民代表人大会是“议会”，“应该对政府唱对台戏”。他的这些意见，今天看来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迫不得已，只好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但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指控，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晓得有什么反党集团”；至于什么“搞颠覆活动”，他说：“我既没有这个志愿，也没有这个胆子！”

批斗会上，陆定一有时不免满头大汗。当时有种说法，说是因为批到了他的痛处。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年过六十的他，在绝食的情况下，站在台上连续接受长达数小时的激烈的批斗，还不时有人上去强制摁下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在不断的折磨下，他会不会有点虚脱呢？

◇ 说陆是严慰冰匿名信的“主谋”，攻击叶群就是攻击“林副统帅”、攻击“伟大领袖”

11日早上和中午，陆定一继续绝食。看守所急了。晚上陆定一还要参加斗争大会，若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经他一番好言规劝，陆定一这才勉强吃了几口上会。

当晚的斗争大会，又集中批判了陆定一在三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一是批判陆定一“疯狂攻击林彪”。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那件事。说从1960年到今年1月，“严慰冰用最恶毒、最下流、最反动的语言，写了数十份攻击林彪同志的反革命匿名信，其中半数以上是用明信片写的，实际上是在广泛散发反革命传单。”并诬陷陆定一说，严的这一切都是在陆的“指使下”干的，陆定一是严慰冰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谋者、指挥者”。至于匿名信的内容究竟如何，怎么“最恶毒、最下流、最反动”，仍旧一点具体情况也没有透露；陆定一怎么是她的“主谋者、指挥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只是说严慰冰写信时陆定一在家，因此他就是严的“主谋”、“主使”和“指挥”。对这种指控，陆定一矢口否认。

二是批判陆定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总根子”。大会说陆定一“一贯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文艺方向，反对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指使周扬、林默涵在文艺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要“罪证”是，《文艺八条》是根据他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的；“文艺界的三股妖风”，即“反题材决定论”，“全民文艺论”，“大捧三十年代文艺”，都是从他那里刮起来的。他讲过这样的话：“对文学艺术来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文艺上要分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无害就是有益又有害。有益的，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只是看到这些。我们还是要看到无害的东西，这是中间的。政策要从这里出发。”“让他们自由，有益无害。”“最大的格格就是不反对社会主义”，在题材、创作方法、流派上要给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自由”。他不赞成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说：“现在连戏剧也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吹毛求疵，搞得什么事都不能动。”“旧戏我看还可以演，演旧戏《蒋干盗书》，也是教育群众。我们还要借别人的头脑，甚至地主的头脑。”“光会斗人，这可危险。有的人一搞就给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帽子多得很，检讨，不行，再检讨，还不行……这是王明的办法。”“打击面越小越好。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斗红了眼睛，不冷静。”“群众运动需要头脑发热。头脑发热就会发生片面性。”“不要搞得文章不敢写了，课也不敢讲了，动也不敢动了。”他讲出的这些，至今看来仍然没有哪一条不对，可在当时却同样条条受到了批判。就连他写于1956年的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全社会高度评价的著名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陆定一受到众口一词的声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他已经看惯了、听惯了，你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懒得去作辩驳，他应付说：“我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不过，他又申明：“我文艺管得少，没有资格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祖师爷。”不无几分幽默。

三是批判陆定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陆定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抓教育。他的主要思想是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实行9年或10年一贯制教育，并就这方面的改革进行了一些试验，如创办北京景山学校等。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有生产斗争的知识，学生要学会用脑来劳动，也要学会用手来劳动，这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要多读书，绝对不能因为参加生产劳动，挤掉上课读书的时间。他从当时农村学生小学毕业后上不了中学，而



农村又亟需农业技术人才的状况，提出了办农业中学的主张，两年后已招生200万，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主意。1962年8月，他曾签发过一个中宣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综合报告，反映教育革命“降低了学生水平，有些学校秩序混乱，大伤元气”，强调学校要把重点放在搞语文、数学、外语，把政治课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当时，这是一个重要举措，一直影响至今。此刻，陆定一处于被告席，谁能想到呢，他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居然也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陆说：“在教育上想搞一个传至万世的东西不可能。对教育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是可以的，在党外也允许反对，不能压。教育方针要靠子孙做结论。”会上批判说，这就是“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陆说：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个目的是提高国家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会上批判说，这就是“妄图培养一批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陆说：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贯彻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要强迫命令”，“不要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不要搞大呼隆”。会上批判说，这就是“极力反对学校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陆说：“学校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要求不能那样严格，吹一声哨子就学毛选。学校的政治工作不能照抄解放军的。”会上批判说，这就是反对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陆说：“没有立，就不要破”，1958年教育革命是“乱、糟、偏”，打破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比不上北洋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的好学校”。会上批判说，这是“恶毒攻击教育大革命，千方百计维护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陆在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中提出：“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毛主席指示教学要“少而精”，“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他认为“少而精究竟怎么样，少到什么程度？怎么少而精？”“课程改革，第一要专家觉悟，第二要掌握分寸，不要搞得‘左’了，‘左’了不行。”会上批判说，这是“明目张胆地‘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公开反对毛主席’”。再就是批判陆定一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陆说过“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会上批判说这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搞“阶级合作”“国共合作”，“妄图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统治我们的学校”，等等。

熊复在大会结束时讲话说：“陆定一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是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颠覆我们这个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把我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三天的斗争大会证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热爱毛主席，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的阶段，彻底把陆定一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捣毁阎王殿、建立新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宣部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时下惯用的那套阶级斗争的恶话、狠话、大话，程式一步不少，套话照说不差。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陆定一这出大戏到此结束，以后部内再也没有开过批斗他的大会。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

## 【史实考证】

### “北兵南调问题”考实

• 夏明星 •

1972年12月，即林彪“九一三”事件1年3个月后，海军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

——海军“四五”会议正在进行时，在“四人帮”主角之一张春桥上窜下跳煽动下，大会之外另成立了一个40人的骨干小组，作为大会中的“小型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说其在林彪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上了贼船”。那时，“上贼船”是个时髦说法，是“林彪死党”、“林彪集团追随者”的代名词。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型会议”开了30多次，几乎每天一会，无中生有地揭发肖劲光的种种“问题”。这种种“问题”中，最耸人听闻的就是所谓“北兵南调问题”。

#### ◇ “北兵南调问题”，“牵连了海军的一批干部”

所谓“北兵南调问题”，是“四人帮”加害肖劲光的五点“证据”之一。对此，《肖劲光回忆录》专门有过澄清：

关于“北兵南调”（或“七九”作战方案）问题。

1971年7月，中国即将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地位，台湾方面反响强烈，在我东南沿海时有大大小小的挑衅和骚扰活动，还有敌情通报说，台湾搞了一个中兴9号演习，以我福建沿海为目标，用一两个师的兵力演习登陆。于是，中央军委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布置备战。李作鹏参加了军委办公会议，回来便提前吹了风，由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司令吴瑞林牵头，潘焱参谋长具体负责，作战部的几个同志昼夜加班，搞了一个作战方案。方案以东南沿海为敌主攻方向，以东海舰队为主，准备必要时将北海舰队的舰船向南调，南海舰队的舰船向东调，支援东南沿海的作战。因为海军的会议是7月9日开的，后来便把这个方案称为“七九方案”。7月13日，毛主席签发了军委《紧跟形势，加强战备》的指示，为此，军委召开小型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单位都带去了作战方案，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全军的作战方案。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多次给予了具体的指示。

肖劲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随机应变的“七九方案”几乎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关于这件事的具体过程，我并不很清楚，是潘焱同志在那里具体搞的。但是，毛泽东同志签署的电报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战部门报告过我。海军的作战方案，我也参加了研究，这完全属于正常的军事行动。然而，这件事在“四五”会议上被危言耸听地说成是“北兵南调”，支持林彪在南方另立中央，并把责任强加在我的头上，成为我“上贼船”的一个“罪证”。

1973年2月24日，中共中央（1973）10号文件全文转发了经过张春桥精心修改的“海军第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大肆诬蔑肖劲光“跟着林彪走”。于是，“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这一莫须有事件，经过张春桥等费尽心机地炮制、导演，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了全党。

无端获罪，肖劲光悲愤不已。对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引起的恶果，他感慨万千：“后来，这个问题写入了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以中共中央（1973）1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牵连了海军的一批干部。潘焱同志为此受到多次不公正的批判，而且殃及了总参谋部、空军及沿海几个大军区的一批人，造成很大的恶果。”

“北兵南调问题”确实“牵连了海军的一批干部”。

开国少将、海军参谋长潘焱（1968年11月上任），“为此受到多次不公正的批判”，1975年8月终于被免去参谋长职务，黯然转任海军顾问。

开国中将、海军常副司令员吴瑞林（1968年8月上任），于1972年10月被免去职务。1974年4月，海军党委在给中央军委的请示中，指责吴瑞林：“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海军‘四五’会议后，迄今不仅一个问题没有交代，还妄想翻中央（1973）10号文件的案。最近检查吴瑞林家里的文件，从中发现有关‘北兵南调’、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以及订攻守同盟等材料百余件。”

◇ “北兵南调问题”，还“殃及了总参谋部、空军及沿海几个大军区的一批人”

在海军搞出“七九”作战方案后，各军兵种都搞了自己的作战方案。接着，中央军委“召开小型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单位都带去了作战方案，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全军的作战方案。”这个“全军的作战方案”，具体负责的是副总参谋长阎仲川（1969年5月上任）。“九一三事件”后，阎仲川首当其冲，当月就被免除职务，隔离审查。他在总参谋部工作仅2年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却长达7年6个月，原因就是所谓“北兵南调问题”。直到1979年4月，他才被解除监管。

开国中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由于被认定为林彪集团骨干，更被怀疑参与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对当年那一幕，吴法宪印象深刻：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突然有人来把我叫醒。我糊里糊涂地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在一座小楼里，吴法宪见到了公安部长李震等人。

李震单刀直入：“空军参谋长梁璞交代说你们搞了一个作战计划。”

吴法宪一头雾水：“空军的作战计划很多，有对苏联的，有对台湾的，有对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

李震点题：“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战计划’。”

吴法宪纳闷：“那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吗？”

李震不回答，只说：“你说说情况吧。”

吴法宪哪敢怠慢，唯恐说得不清楚：

一九七一年五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来华，进行中美会谈，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尼克松本人也向斯诺表示愿意访问中国，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时联合国也有恢复中国代表席位的可能。这个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因此台湾必然要想方设法地破坏中美谈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研究对美政策时，毛主席、周恩来都提出要防范台湾方面破坏中美谈判的行动。后来果然，军委、总参和外交部不断地报来材料，说是台湾方面准备采取行动。为此，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示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和作战部长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认为，台湾方面有可能采取陆、海、空军统一行动的方案。会议分析，陆军登陆可能有两个方案，第一、以一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登陆，企图占领一个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个团的兵力打上来，占领几天就走；第三、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突然袭击，抓一把就走。另外，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也有可能同时袭击我舰队港口、沿海城市和空军基地。侦察机也可能深入内地进行侦察活动，其重点可能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会议以后，我们将情况以及对台作战的反击方案，都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毛主席批示照办，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画圈表示同意。（《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当时，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空军又召开了各军区空军首长会议，研究并确定了空军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在不削弱北方对苏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则下，调整兵力如下：第一，调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在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配置地空导弹；第二，调四个高炮团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力量。

吴法宪告诉李震：“以上安排，于七月底上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并上报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准后，立即行动。这就是梁璞讲的‘空军的作战计划’。”

最后，吴法宪又特意补充说：“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保存有这个计划，你们只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吴法宪随后又把讲话内容写成材料交给李震。李震不动声色地问：“这个计划是林彪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的计划，你知道吗？”

吴法宪差点吓晕过去，拼命辩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林彪要搞‘军事政变’，他要搞军事政变能这样明目张胆吗？几次召开会议研究，上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难道他就不怕暴露吗？我从来没有听说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说起这件事情。”

但无论吴法宪如何解释，他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反复审查。

◇ “‘北兵南调’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下发的作战方案”

“四人帮”以打击林彪余党为名，利用所谓“北兵南调问题”渗入军队。对此，肖劲光心知肚明：

其实，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完全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的一个正常的军事行动，它与林彪反革命政变并没有联系，只是在时间上巧合。张春桥、江青抓这个问题作为我“上贼船”的罪证，是根本立不住的。

对于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吴法宪也不眼拙：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人为了邀功请赏而捅上去的。但是也不能这样捕风捉影。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决定的事情也成了“政变”吗？这未免太儿戏了吧！这种事情别人不清楚，难道政治局的人，包括周恩来也不清楚吗？

以后我听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很大的悬案。这未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渲染了，被歪曲了。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只要说得神乎其神，大家就相信。说它很平常，很正常，人们就不相信。群众是这样，难道我们的领导干部也都成了这样吗？（《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事实上，早在海军党委会议上提出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后，周总理、叶剑英元帅就都很重视。1972年10月，周总理派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扶之带工作组到海军调查了半个月，“查阅了海军有关部队调动的所有文件，都是根据军委、总参的指示进行的，没有问题。有关军区和海、空军，在那个时间里，侧重抓一下东南沿海战备工作是必要的。”

然而，批林批孔于1974年1月开始后，“四人帮”却蓄意策划，制造谎言，大放厥词，

又把那次战备工作说成是“北兵南调”，“是个大阴谋”，并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下令追查，企图找出周总理在所谓“北兵南调问题”上的“问题”，因而又涉及军队的一大批干部。

1974年2月21日，王洪文私自派秘书到总参谋部作战部，把根据周总理指示和批示承办的文电34份全部调走，直到周总理逝世后的1976年5月13日才退给作战部。4月1日，王洪文又指使人到作战部要走那次战备的全部核心机密文件，并在他们手里控制了半年之久。

4月26日，王洪文、张春桥又强令作战部于5月1日后清查所谓“北兵南调问题”。张春桥故弄玄虚地说：“北兵南调”，是“利用合法的形式搞阴谋，要从正常中找不正常。”5月4日，王洪文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部布置清查“北兵南调”，凭空定调说：“北兵南调问题要作为一个重点”，“搞北兵南调问题，同你们现在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首都搞政变阴谋是一致的，有联系的。”在清查过程中，王洪文又大放厥词：“北兵南调肯定是阴谋，再查性质也变不了，问题在于把情况搞清楚，把他们如何策划搞清楚。”

“四人帮”阴谋把周总理及参加那次战备工作的有关领导及军委总部、有关军区海空军的负责人，都同林彪反党集团捆在一起，目的是要打倒周总理。

所幸，由于周总理应对得力，最终“四人帮”没有把柄可抓，这一阴谋没有造成太大恶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乌云散去。对“四人帮”放火烧总参谋部，在作战部大肆调查所谓“北兵南调问题”，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部署决定予以平反。当时，总参谋部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撤销了一些同志受“北兵南调问题”影响所做的错误结论，公开为遭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

1979年2月3日，总政治部向军委、党中央正式报送了《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对作为肖劲光上“贼船”证据的五个问题，一一作了说明：

关于“北兵南调”问题。“北兵南调”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军委下发的作战方案，肖劲光同志执行了指示，没有责任。1973年中央10号文件中说肖劲光同志“负有严重责任”是不对的。

1979年3月5日，党中央发出通知（中发19号），批转了总政治部的“复查报告”。同时决定，撤销张春桥插手搞的1973年中发10号文件（文件中涉及其他人的问题，建议海军另行处理），将中央本通知连同总政的“复查报告”，在中发10号文件传达范围内传达，海军传达到全体干部。至此，“北兵南调”悬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之后，阎仲川也得到解放。

同时，吴法宪、吴瑞林在这个所谓“问题”上，也没有被继续追查。

□ 原载《党史纵横》2014年第10期

~~~~~

## 【不堪回首】

###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 丁学良 •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下的农民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虽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斗”，农民们却很少买账。遇上围城的农民，我们红卫兵跟他们辩论，说“《十六条》规定如何如何……”，农民会把大嘴一撇：“你们有《十六条》，老子有扁担一条！”

被扁担一条多次教训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自然不甘心于手无寸铁闹革命的雅致方式，但是不论我们怎样地想方设法，总是比对方差了一大截。

在武斗的军备竞赛中相对保守的一方（俗称“老保”即“保皇派”）比激进的一方享有突出的优势，此中原因不难解释。比较保守的那方背地里对走资派很温和，走资派背地里对他们就很照顾。走资派当权多年，手里的有形无形的资源并没有一夜间都给剥夺干净，关键时刻点拨一下，结果便大不一样。

#### ◇ 送枪

待到我们激进派紧随老保们，也用木棒、铁棍、大刀、长矛之类自制的兵器武装起来，武斗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地与时俱进，跨上一个崭新的台阶——真枪实弹。在我们那里，这个新台阶大约是1967年的秋季攀登上的。老保那一派得了人武部系统的内部指点，把民兵的军械库给抢了，这当然是明抢暗送。民兵的军械库原本是分散到人民公社和镇一级保管的，武斗一开打，就集中保管了，保管的地点和军械的品种都是极机密的，非人武部的领导干部无缘知晓。可我们那儿的老保们一抢就抢了个准，短枪、长枪、机关枪、子弹、刺刀、手榴弹都成龙配套地放在一处，抢来就能分发下去用于实战。而我们一派的人到人武部去抢枪，抢到的都是些没有枪栓的三八大盖或者铁锈丰富的裂牙刺刀，连颗完整的手榴弹都没抢着。

你想想看，当敌对一方已经用真枪实弹全副武装起来，而自己一方却还是手持粗木棍和尖铁矛，心里哪能不打鼓？我们那时候又没有得高人指点，没琢磨出来“非对称战略战术”，因此成天急得团团转。

这期间我们一派的指挥部为着保存实力，也曾连夜把少数骨干人员秘密运送到南京去暂时避难。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在狭窄的卡车车厢里，与颇为倾慕的一位同姓不同性的红卫兵领袖相对而坐，总希望这逃难之旅越长越好。江苏那时全省分成两大派，一派称“好派”，一派称“屁派”，源于对一次全省范围内向江苏省原省委及省政府夺权的大举动，是持“好得狠！”还是“好个屁！”的正反态度。奇怪的是，这两大派在本省内打得不可开交，却对安徽省的局势持完全一致的态度，统统站在我们激进造反派的一边。

#### ◇ 抢枪

在南京短暂避难返皖以后，我们就琢磨从哪里弄到大批军械自我武装。“大批”的意思是成千上万，因为这时候的本派骨干分子已经配备了真枪实弹。我本人作为“文攻队”的主将，即便没有上阵杀敌的光荣任务，也领有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造的驳壳枪，俗称“盒子炮”。年纪虽然大了一点，却威力十足，扳机一扣，轰隆如雷，凭我的手劲，根本稳不住它；你明明瞄准着正前方，枪口会震偏到三十度开外，把左右并肩的战友吓得鼠窜。好在我分得的子弹少，不足二十发，难以每日开火威胁到战友们安全。至于这批枪支从何处弄来，却是本派的最高机密，好像是一位很同情我方的民兵干部，怕我们全都亡命于对方绝对优势的武力之下，暗暗通气，半偷半送地让我们得了几十支老爷枪械护身。

解决枪荒的目标很快落实到南京军区驻宣城南门制高点的通讯站大院里，这通讯站就在我们宣城中学的隔壁，它的后部又与一间军用被服厂大院相连接，范围极广大。通讯站大院里有几排大平房盖成的军用物资仓库，神秘兮兮的军事单位，与学校的男女厕所只有一墙之隔，虽然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它的大门口，它却从不露内里真相。本派“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对方一派称其为“脸紫”，意思是我们都快要死了——准确得悉那几排平房仓库里藏有大批军火，不可能没有内线的通报。那间被服厂里有数百名军人家属做职工，不算是正式的士兵，居住在县城的平民社区，十有八九是她们中间某几个人给“联指”的头头们通风报了信。不过“联指”的核心领导层没敢大意，安排了至少一起秘密核实的操作，听说是先把通讯站的厕所下水道堵住，接着派人扮作淘大粪的农民，混进通讯站大院里，把那几排军用仓库察看得仔仔细细。所以当我们接到抢枪的行动命令的同时，也都接到详细的地形方位介绍，告诉每一个人冲进通讯站大院后，应该朝什么方向怎么跑、跑多远、怎么入室、怎么撤离。

冲击军事禁地——通讯站乃属军队的神经系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时至1967年的年底，虽然已经有江青一帮喊出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文攻武卫！”等等，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心里还是没有底。那个年头是章法全乱的时代，没有任何文件正式宣布“严禁冲击军事要地，违者镇压！”的法令不再有效。我们在南京避难的时候，就亲眼目睹包围着南京军区大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敢朝里冲，因为军区司令许世友发了狠话：南京军区担负对台湾和美国第七舰队作战的重任，谁敢冲击他的指挥部禁地，格杀勿论！我们宣城的军事通讯站，是南京军区管辖，万一这位少林和尚出身的许司令发了毛下令开火怎么办？

这许和尚在我们那一带是极有威慑力的，传说他禁止任何人不经报告跨进他的办公室，违者丢下小命。他的妻子有天忘了这条禁令，被他手起一枪击毙；他当时坐在办公桌前，背都没有转过来，手枪是由腋下反腕射击的，可见枪法之准。又传说某次毛泽东也没经报告走进他的办公室，被他打了一个耳光：“你要不是我的主席，今天也没命了。不过军令不能当儿戏，权且以一巴掌充罚。”可见他治军之严。这类传说的准确性，老百姓无缘求证，但它们的心理效力，却十足实在，因此“联指”头头们要把高风险因素，纳入行动计划之中。

当时最能为我们壮胆的，是林彪和江青的有关讲话，规劝红卫兵小将不要随便冲击部队驻地，同时规劝战士们万一被小将们冲击，要持克制态度，多做说服教育工作。“联指”领导层的部署由此而定为：让红卫兵做抢枪的先锋，如果部队不开枪，其他的造反派（他们都是成年人）就跟上去。事实上被当作炮灰使的我们，却觉得受到极高的重视而扬扬得意；我本来不在抢枪先锋队之列，哇哇叫抗议了一通，才被接纳参与。

那个星期日早晨8点半钟左右——选取这个时刻是要趁部队战士休息日吃过早饭正忙于洗衣服之机——我们从军事通讯站的侧面发起突然袭击。五六百名中学生红卫兵的一小部分从侧大门往里强行进入，引得所有值班的士兵全都集中到大门口排成队伍阻挡，大部分红卫兵却埋伏在宣城中学围墙的内侧，见势便一拥而上，一人肩头托一人从围墙上翻身而入军营。慌乱之中士兵们跑过来拦截，正中了我方的计谋，势单力薄的大门立时被撞开，紧随着红卫兵的造反派大队伍蜂拥而来，军营里马上乱了套。面对着数千名有备而来的抢枪人员，百把名士兵只能高呼毛主席语录，秀才遇到兵地做无为的宣导。不过这里的“秀才”其实是兵，这里的“兵”反倒成了秀才。

我置身于红卫兵队伍里，被动地卷入抢枪的第一波洪流，直扑大平房军械仓库。几百人的冲刺下，仓库门窗顿时灰飞烟灭，我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滚到了放满手枪的柜头。我本能地伸手、本能地缩手，把闪着蓝光的崭新的“五四式”手枪一支又一支地塞进外衣的口袋、内衣的口袋和所有能插进手枪的裤腰带空隙处。直到我被压得再也透不过气的当口——周围全是

人挤人、人压人、人叠着人，一片挣扎声、号叫声和汗臭味——才从人堆缝隙里爬出来，朝事先“联指”头头们部署的方向撤离。

这时候军营里已经是尘埃落定，局势分明。大兵们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判定他们人单势薄，无法层层设防、步步为营，于是采用林彪在东北战场上实践的“三三制”，也就是三个士兵结成一组，围歼一名敌人。他们集中守在侧门口和围墙的低矮处，见到有不穿军装的人往外跑，就三对一地围攻上来，先缴械后放人。红卫兵小孩们抢到枪后，多半是谁得手谁先跑，已成散兵游勇。收获丰盛的我，气喘吁吁地直奔围墙，一看那高度，再看无人肩托，就傻了眼：那墙壁万万不是我辈可以纵身而过的；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闯侧大门。守在那儿的几组士兵们一看我，三面合围，把我从地面直提起来，双脚落空，裤腰带周边的手枪纷纷掉下；然后他们把手伸入我的口袋，又有一番收获——总共缴到七支手枪。

我大声抗议，大声号叫，大声骂街，大声威胁，一点用也没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兵看着我这个不到他们肩头高的男孩在那里口出狂言，反倒觉得是一种消遣；无奈的我只好满口吐沫星子地被扔出了军营侧门。

我的愤怒其实主要不在那七支手枪中的六支，而在其中的一支。我去抢枪的时候，随身带去了那支德国造的“盒子炮”；大兵们不问三七二十一，把它也给收缴了。我回去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呢？我们一派那么缺枪，组织上那么看重我，分给我一把手枪自卫，我却把它给丢了！耻辱啊耻辱！别人去抢枪，要么是抢到的多，要么是抢到的少，最差的也就是空手而归罢了，而我抢到的却是负数。“你是唯一的一个去抢解放军的枪反被解放军抢了枪的小将。”我们那派红卫兵的武卫头头“大肚子”跟我说，“你哪算是革命小将，顶多算是芝麻酱，蚕豆酱，酸辣酱。”

“大肚子”的话不纯粹是挖苦，他对我如兄长一般地爱护。他的肚子从外表看一点都不大，又高又瘦，主要是他嘴馋，每时每刻都在想象着吃和谈论着吃，并宣称能一顿吃下四锅锅贴饺也就是四十八只，或者十六只五香鸡蛋，饱嗝都不会打一个。他对任何物品贵贱的衡量，也都是以锅贴饺为单位：“这双胶鞋值三锅锅贴饺，还可以。”看见一个走资派腕上的国产手表，问到是一百二十块钱，他惊呼：“你这个资产阶级，手上戴了一年吃的锅贴饺！”在整个武斗期间，危险时刻“大肚子”都用他的身体护着我。

本派红卫兵组织出面，与军事通讯站交涉，要求归还我的那支被他们收缴去的驳壳枪。当兵的一肚子气，原不想还，后来发现这支德国造的手枪在他们那儿不好登记入册，就还给了我们。组织上照顾我年小体弱，换配给我一支“五四式”手枪，小得多，轻得多，好使得多。

#### ◇ 耍枪

那一次抢枪，令我方增添了数百支轻重枪械，不过所获弹药并不多。在小将们抢到的军火中，最壮观的是一门双管高射机关枪，单单枪管本身就有三公尺多长，加上底座，足足五公尺长。可惜没有枪栓，也没有子弹，开不起火来——这显然是部队做了防范措施，把一门高射枪分作两处储藏，“一枪两地”，抢来无用。不过我们还是充分发挥了它的威慑力，将它置放在宣城中学第一教学大楼的楼上正中央，枪管从堆着沙包的门洞平伸出去，气势汹汹，弄得外界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接近宣城中学的地界。

我们手持形形色色武器的红卫兵小将，一开始给对立派别“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我们称其为“红肿”，意思是他们的小命都长不了——造成的威胁，还不如给我们自己造成的威胁大。在抢枪后的几个星期里，失手走火事件不断。十四岁的侯黑子，抢到一支仿苏制AK47全自动冲锋枪，又抢到子弹，在军事通讯站门口不远处就要弄起来，招来一群小孩围



观。侯黑子吃力地端起有他身体一大半长的冲锋枪，瞄准着一个孩子，嘴里“蹦蹦”两声——他把它当成了玩具枪，旁边的孩子们也把它当成了玩具枪，可是枪口真的崩出两发子弹，一个小孩当场毙命。还不够成年的侯黑子后来被判了三年劳教，放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猛然增了二十岁，真是“洞中才一岁，世上已千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劳改系统里得到最充分的验证。

有两起走火，就发生在我的近旁。一日我们聚集在第二教学楼的教室里，那儿已经被我们用作睡觉兼值班的场所，几张双人床的上下铺都坐着人，多数人手里拿着枪。坐在下铺的白大舌头——他姓白，长得倒像黑包公——说到激动处，把一杆1950年制的美国半自动卡宾枪往地板上用力一跺，枪托落地之时，一串子弹连发，从坐在上铺的长得像石头一样结实的张墩的两条大腿根儿之间直射上天花板。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没伤着独生子张墩的命根子，却把他震得几分钟站不起来，木在那儿。那种型号的美制卡宾枪最易滑膛，从那天以后没人敢用它来站岗值勤，半夜三更走火，自己人会跟自己人误打误杀起来的。

另一起走火的主儿，便是“大肚子”。那次抢枪之后，他换了一支崭新带皮套的“五四式”手枪，又多得了几十发子弹，神气活现，逢人就炫耀他的枪和他对枪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他的口才极佳，枪法也挺好，说着说着，以动作佐言论，举枪朝一位听得入迷的胖女同学腿部隔空轻轻一点。谁也没有料到这支手枪是子弹上了膛的——事后“大肚子”埋怨别人玩弄他的枪把子弹顶上去没告诉他，其他的人却推测多半是他自己吹牛吹昏了头忘记枪膛里有子弹——那轻轻一点，就在该位胖女同学的腿上部击穿了一个眼，鲜血涌出，满屋子人的脸刷白。

手忙脚乱的我们吧受伤者抬上担架，运往芜湖的大医院做手术。胖女同学的家是农村的，父母亲惊吓之余，最担心的就是女儿会不会成残废，下不了田，做不了重活，也嫁不了好人家。有一年之久，“大肚子”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他必须娶回伤在他枪口之下的胖女同学，供养她一辈子。我们旁边的人倒没那么担忧，因为都看出来那学习成绩出色的女同学根本看不上“大肚子”，即使腿治不愈，也未必愿意下嫁于他。

#### ◇ 造枪

对于我们“脸紫”一派在军事装备上大大落后于“红肿”一派的情况，绝大部分人的主张是通过抢枪来改变，极少数人的主意是土法上马、自造枪炮。持后一种想法的小将里有一位人称“工程师”，是宣城中学高二的学生。他发起的最重要的军备工程是三项，我亲身参与了一项，亲眼目睹了两项，全都称得上轰轰烈烈。

我亲身参与的那一项是制造硝化甘油，一种比梯恩梯（TNT）猛烈得多的液体炸药。“工程师”从一本苏联的化学教科书上读到制造的方法，但他性急，只读完前半，后半没读就拉着我去动手，而后一半是关于安全措施。我俩在一间单人教师宿舍里操作，那是1968年初夏的夜晚，小方桌上放了一口直径约五十厘米的深玻璃缸，是从学校实验室拿来的。他朝玻璃缸里缓缓地倒浓硫酸，再倒浓硝酸，让我拿着玻璃棒搅拌均匀。那本教科书的安全措施一章用粗黑体字告诫——这是我们事后才读到的——浓硫酸混合浓硝酸的时候，严格禁止碰撞。玻璃棒搅拌过程中，不时碰撞到玻璃缸，十几秒钟后，玻璃缸里骤然腾起一柱蘑菇云状的液体夹气体，直冲而上，碰到天花板后，散落下来，我们的身上火燎燎地灼痛。“工程师”大叫：“赶快跑！跑，快跑出去！”他一马当先，我尾随其后，跑到自来水龙头下全身冲洗。我离那口玻璃缸近，溅上的化学试剂比他多，圆领衫已经成了一片渔网，右手的食指中指上几小块皮肉已经烂掉，能见着里面白森森的筋骨。医生告诉我们，浓硫酸混合浓硝酸，叫“镪水”，俗称“王水”，连钢铁都能腐蚀掉，何况皮肉！抗日战争前的中国著名影片《夜半歌声》，赵丹扮演的男主角的那张吓坏了众多小孩的脸，就是伤在仇人泼的“王水”之下。

从此以后，我就谢绝做“工程师”的助手。

“工程师”却没有打退堂鼓，他琢磨着怎样把生铁铸造的七八寸直径的自来水输送管改制成土炮，因为我们那座高射机关枪只能吓人，不能轰人，他担心我方的革命事业会因此而夭折。试炮那天，正值我们红卫兵组织开大会，“工程师”把土炮里塞进黑色火药，再填充一些碎铁片，将一条长板凳翻转过来做炮架。为了测出土炮的最远射程，“工程师”决定土炮安放在第二教学大楼的二层正中后方，炮口朝向学校南面的空旷菜地。在点燃土炮引信之前，“工程师”忽然觉得板凳炮架不够稳，他让同班好友小何用脚顶住板凳的一头，再喊几个小将扶着。小何的脚已经顶在那儿了，“工程师”手上的香烟火已经快碰上引信了，小何脑子里忽然闪过物理课上老师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把脚抽了回去。

数秒钟之后，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一团火球从半空飞越校园，紧接着，二层楼上几声惊叫。红卫兵们从开会处跑出来，只见土炮的炮身把板凳炮架撞碎，在地板上插了一个窟窿，炮身滚到墙边，墙壁被砸下一块。那几声惊叫发自小何及身边的人：他们的腿脚幸亏没有做炮架的延伸。

“工程师”的第三个军备项目属于高科技，他设计出遥控飞机模型，力图使模型悬挂炸弹飞行一千至二千公尺，对准敌方的武斗据点大楼，撞上去引爆。飞机模型遥控飞行已经试验成功，可惜载重量太小，不足二公斤。这般细小的黑色火药炸弹，很难对结构坚实的大楼造成有效的破坏；于是“工程师”就把全部精力用于研制高效固体炸药，也招到了两三名不怕死的助手。大概是在1968年的夏秋之交，晚间九十点钟的光景，从“工程师”的实验室里，发出沉闷的连环爆炸声：他们在朝炸弹壳里装填火药的时候，挤压过紧，一枚炸弹首先从“工程师”的手掌中开花，引发旁边的火药爆炸。万幸的是实验室里的几枚炸弹都没有封口，不然他们全都命了。“工程师”本人被炸成一级伤残（仅次于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级伤残），助手们三级伤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冲进实验室时的情景：满屋浓烟，昏黄的灯光下，三个人在地上打滚；皮肉烧焦的臭味呛得人难以透气，我们手臂中的伤员痛苦地号叫，他们的头和手覆盖着暗红的血浆和灰烬。

#### ◇ 使枪

延续一年的真枪实弹混战期间，对方“红肿”控制着宣城的城北边和西边，武斗大本营设北门底的发电厂，因为那儿有全城最高的厂房大楼。我方“脸紫”控制着城东边和南边，武斗大本营设在东门的面粉厂，因为那儿有全城次高的厂房大楼。城中部的十字路口和城周边的公路线，是双方拉锯战的争夺之地。居民们夹在两派之间，提心吊胆，时不时地有无辜民众伤亡于流弹之下。

我们多了一些武器装备后，就试着稍稍扩张地盘。宣城俗称乌龟地，十字路口是乌龟背，又有一栋带顶四层楼的百货公司（全城最高的商业建筑），和一栋带顶三层楼的食品商店，战略地位不言自明。某一日我方得到情报，敌人刚偷偷占据了那栋百货公司大楼。此事若是真的，后果会很严重：他们的火力能居高临下直接威胁到东门大街的一小半，我方的势力范围要向后缩减五六百公尺。“联指”的头头们急得火烧火燎，“大肚子”当即请战，带领一个小组前去探个真伪。为了表示能独当一面，他坚决要求此一重任全由小将们完成。

领到军令后，“大肚子”亲手点了五个高中生红卫兵再加上我；我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但他没办法拒绝我，因为我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他日后所有的恋爱信都出自我的手，虽然没有一例成功）。我们六个人都把平日佩带的手枪留下，换上长枪，只有“大肚子”例外，长短枪各带一支。我的是仿苏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带刺刀，枪不重，很易瞄准，可惜子弹太少，才

二十来发。早年国民党正规军讥笑共产党游击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我们红卫兵造反派的境况，也相差不远。

趁着夜深无人，我们蛇行猫爬，沿着破烂的老民居之间的狭窄巷道和浓臭的污水沟，慢慢地接近了十字街。一贯咋咋呼呼的“大肚子”，到了关键时刻，机警过人。他说咱们不能冒冒失失地去侦探那栋目标百货公司，如果“红肿”的人已经占了它，守备部队一定比咱们这支侦察小组强得多，我们不如先探一探它对面的那栋食品商店。

朝食品商店的后院扔了两块小石头，没有反应，我们在外面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没动静，就撬开商店后面的防火门，爬上二楼。那个冬夜的月光很好，照着厚厚的积雪，反射出淡雅的光，我们即使不敢开电灯，也能模糊看到靠近窗口的室内布局和室外的大物件。隔着宽宽的十字街，那栋百货公司大楼里却是黑洞洞的一片。我近视，当然看不出什么异样，两位眼睛敏锐的战友——其中一位是差点当了土炮炮架延伸物的小何，以后他成为空军飞行教官，眼力端的是好——隐约瞧见百货大楼里有烟头的火星闪烁。“大肚子”脑筋一转，从窗户上卸下一块玻璃，自己猫缩在窗沿底下，背靠墙壁，举起玻璃的一半，朝百货大楼那面晃动。玻璃把月光反射到对面，微弱的一团银白色，那里面立刻就有了动静：一管机关枪从百货大楼窗口伸出来。好了，证实了！“大肚子”派一个自称“齐天大圣”、长跑特棒的红卫兵马上赶回“联指”大本营去报告，并说这栋食品商店楼不能再给敌人占领了，我们红卫兵侦察小组一定在这儿坚持到援兵上来，人在楼在。

这食品商店楼的二层有两个楼梯口，一个被办公桌椅堵死。“齐天大圣”一走，我们剩下的六个人就各守一个方向，“大肚子”中央调度，兼顾四面。我们主要防守在几个大窗户旁，从那里可以眼观各处。等了两个钟头，大本营还没有派增援队伍上来，我们又饥又乏又提心吊胆。“大肚子”自己的烟瘾也上来了，不敢抽，怕给对方发现。我们也都劝他忍忍，天亮后再抽就不怕火光被敌人看见了。

可是肚子饿的问题却不能再等待！食品商店楼的二层是办公室，地面一层才是零售柜台。要弄到吃的，必须到下面去找。我和一个姓程的中学前平衡木冠军饿得最熬不住，就从楼梯摸下去。下面的几扇厚重大门都封得严严实实，并没有透光的窗口，我俩又不敢开灯，像做贼一样顺着玻璃柜台东摸摸，西捏捏。绝大多数的柜台里都是空空荡荡，摸了好一阵，手才触到一格柜台里剩有的一袋物品，我俩喜出望外，抓过来，再摸索。黑暗之中，“唧唧唧唧……”一串响，柜台里一只空搪瓷盘子被我们弄翻，滚下地来。

这一串响，在那战时状态的万籁俱寂的冬日的凌晨，真是空谷长啸，余音不绝。突然间，对面百货大楼厉声喝问：“食品店里有人，干什么的？快出来！”我们哪敢吱声，缩手缩脚往楼上退。对方连喝问几声，都不得回音，“啪啪”朝我们楼下打了两枪，子弹射穿厚木门，闷声闷响。“大肚子”憋到现在，一肚子火，倚着窗口斜角，回了一枪。这下子等于互报名号了，对面的机枪毫不迟疑地扫过来一个连发，把一扇窗户的两页玻璃给掀了。

我们可怜，既无机枪，又少子弹，跟对方较量不起来。但年少好胜且好奇，给人白白打枪，不甘心；分吃着我和程前冠军从楼底下搜索到的那袋子东西——提到楼上才看清是冰糖冬瓜条——大家寻思该怎么办。“大肚子”说天已经蒙蒙亮了，玻璃能发挥点新作用了。我们分了工，枪法次的两个人（当然包括唯一戴着眼镜的我）学“大肚子”那样，轮番举玻璃；枪法好的人伏在窗口角落，瞄准对面百货大楼的窗户。玻璃一举，一片白光闪出，对方就扫过来几枪，咱们的枪手便趁机回击一枪。我们觉得这是好战术：诱敌人伸出头，好打；引敌人多开枪，耗他们的弹药；与对方磨时间，等我们的增援部队上来。

后两个目的多少达到了，特别是最后一个，要是我们老不开枪，“红肿”的人一定会大摇大摆地过来搜索。第一个目标却没有什么进展，咱们的那几个枪手，武艺实属平平，还击的枪弹，最佳的也就是击中对面大楼的玻璃窗上，玻璃打碎咱好歹能听得见，就是没听见人中枪的号叫声。

我们六条好汉就这么守着，直到第二天中午，都不敢下楼去，因为食品商店一层临街的那面只有几根水泥柱，大部分是厚木板的门面，挡不了机枪扫射的。咱们六个小将的子弹加起来也不足三百发，吝啬地零零星星地向对方射击着，只求唬住他们不要穿过十字街冲到我们楼下。这期间把我吓得不轻的，是“大肚子”要替换我，举一举玻璃挑逗敌人；他一米八零的个子，稍不留心，玻璃举得太高，给对方一梭子机枪扫过来，正中他手里的玻璃，击得粉碎，碎片弹到我俩的脸上，细小的血珠滋滋地滚下来，我们趴在楼板上，老实了很多。直到第二天午饭时刻，“联指”大本营派遣的增援队才携带两挺轻机枪到来，把我们给换了回去。他们好几个是退伍军人，一副对枪林弹雨满不在乎的神情；他们最受不了的，倒是我们在楼板上留下的浓烈尿味：我们怕下楼挨上枪子儿，将小便全放射在楼板上。

在我们那儿的武斗岁月里，血淋淋的豪言多半是红卫兵小将说出来的，血淋淋的壮举却多半不是他们做出来的。在武斗全过程中，工人叔叔们都护着小将，厮杀的时候冲在前头，撤退的时候殿在后头。

宣城的几场恶战，我们一派的生力军是码头工人。数百年来，码头工人挣一口饭吃，靠的就是力气、勇气 and 义气。他们的基本工具，是一辆双轮人力板车，装满了货物，足有千把公斤。上货卸货，凭的是一副肩膀；拉车推车，凭的是一双手臂。你要想象他们的体魄，看看长江三峡背纤船夫的老照片，就差不多离了。

码头上的活，太弱了，是抢不到手的，为了护地盘，打架是常有的事。一人对一人的架要打，一人对一群的架也得打。打得吐血，从板车扶把上解下酒壶，仰首喝几大口，再打。对手喝这护气止血酒的时候，任你是生死仇敌，也不能出手相击，一直要等到他把酒壶挂回车把，抹抹嘴，才能再接着打。打伤打死，双方都不报案，认了。自幼在江边长大的我，路上遇到肩头搭着腰带、手里提着酒壶的码头工人，会闪过一旁，心存敬意，为他让道。

武斗一启，码头工人的“钢筋铁骨战斗队”全都加入了我们一派，建筑工人的“铜墙铁壁战斗队”则加入了对方派；生死相搏，乃由他们承担。两派的战斗，均有实战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幕后策划指挥；我们这方的军师是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兵打过死战的一名黄团长，对方的军师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位战斗英雄营长，旗鼓相当。

那年（1969）开初，我方的突击队趁对方元宵节过小年的时候，半夜里摸到他们的大本营附近，横扫了一通机关枪，轰了几发迫击炮，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还绑架回来两个俘虏，得到对方的一些军事机密。“红肿”头头为此大为光火，精心设计了一套谋略。他们先是发送一支车队，帆布车篷包装严密，接着派一个两面奸细暗中透风，说那支车队运送的是一批军火。我方最缺武器弹药，得此情报，颇为心动，派出两个排的兵力七十多人，携带两挺轻机枪，每人配备全自动和半自动冲锋枪，从东门穿过几条曲折小道，直插城西边的公路口。

对方的生力军早已沿途埋伏，兵员、武器、弹药都多过我方几倍。一场恶战，他们伤了三四个；我方拖回来七八具尸体，轻重伤员十多名，死伤的都是“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一辆辆半新不旧的板车上——那是他们生前赖以养家糊口的伙伴——躺着满身弹孔的工人叔叔，他们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样威风不减。失去丈夫的婶婶们携着半大不小的一群孩子，在寒风中吼叫。这些妇女多年相伴丈夫劳作于强者才能生存的码头，在刀口上舔饭吃，养

就一副粗放刚烈不认命的豪气，哀哭不出几声，落不下几滴泪，只嚷着要亲手复仇。在空旷的库房里，遗体供战友们凭吊了三日，那几天我用毛笔写挽联写到手腕红肿。出殡那天，领头的是十六人持执的“联指”巨幅战旗。接着是八部卡车，每部载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钢筋焊接而成，花也是铁的）和一具棺材。接着是三百名“钢筋铁骨战斗队”的码头工人，每人右手执一柄粗木棍——那是他们日常劳作搬运重物时支撑板车的杠杆，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带。他们以数百年不变的行头，护送着亡友。凛冽寒风中，众人均是粗布褴褛单衣，隐约露出古铜色的肌体，那场景，宛然重见秦末田横五百壮士。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

~~~~~  
【史海钩沉】

周恩来对阎红彦之死的定性讲话

· 孙 陇 ·

阎红彦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开始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元月8日自杀身亡。阎红彦是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省委第一书记。在阎红彦去世一个星期后，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在会议上周恩来以阎红彦之死为例来教育各大区和各省的书记：

再剖析一个云南，原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一点，整个云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西藏怎样？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一点。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情，想避开也是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对李井泉的领导不满，但是，是不是站在正确方向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三个省落后性相同，但是四川顽抗，搞白色恐怖，打击群众，因有些人起来反抗，四川的盖子还没有揭开。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绩，过去的关都过去了，但顶大的关过不去了。薄一波不揪出来，但也有人议论打倒他。阎不走这条路，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同志，现在不能这样说来。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她不请教主席，她不读毛主席的书，最近事件发生后，郭超同志来反映，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对林彪同志报告不看，读语录是说说的，不请教群众，怕群众怕得要命，然后把自己放在斗争的位置，这也根本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哪一点应该请教主席，哪一点不符合群众要求，哪一点对同事不以平等态度待人。第一次乒乓球赛时，阎只批评李井泉，不批评自己，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他是和高岗不同的来标榜，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给鸦片烟吃？反高岗后，阎背上包袱，平时也只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以后，这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阎不敢出来了，在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人委，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去向不知道，他不告群众，群众恼了，把他压在汽车上游街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后泣不成声，不吃晚饭。

……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们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安眠药几十片后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个态度，不但是压制群众，而是对抗毛主席的

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阎之乱，有人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赵被重伤，这显然有人指使。阎是自己可耻的解决了。斗争锋芒不能指向军区，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中央呼吁撤出来，多些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不上交，中央各部和各省委，都没有过了关，高高兴兴的回去，准备过好这一关，是否能过关，决定于本人。今天就说这些，相信绝大多数人能过好这一关，林总叫我做思想工作，我就讲这些。

（摘自《周总理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3月21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红三司翻印，有关这个讲话的翻印稿比较多，内容基本一致，所见各版本仅个别地方有增减。）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阎红彦之死的问题上主要提到如下几点：

首先，给阎红彦之死定性，是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周恩来也给出了理由，一是他的思想历史根源如此，有着一个抽鸦片的父亲，还有着一个是封建婆的妻子，特别是这个妻子不注重读毛主席的书；二是对红卫兵造反派不支持，采取防和挡的态度；因此，他的死是叛党。

其次，在文革初期，党内的一些老干部对文革如此疯狂的开展还是持有一定的异议，1967年2月的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在这个讲话中周对当时所流传的“谣言”即阎红彦之死“嫁祸”于红卫兵也进行澄清，并用“可耻”之词形容阎红彦的行为，并进一步指出散布这样的“谣言”是有人背后指使的。言外之意，不言自明，矛头对准的是那些自身难保的老革命。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提醒在座的各位封疆大吏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如何能够过这一关？不要以阎红彦为榜样，人家要斗就要人家斗，要不然也要落得和阎红彦一样的下场。可惜，这些封疆大吏们无论怎么办，该斗的还是被斗，以后的日子都不好过，还是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阎红彦的死，对当时的老干部触动很大，原本想着这样一场运动，再深入发展也总不至于闹出让这些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付出生命代价的程度，更何况据陈丕显回忆录所说阎红彦是毛泽东列出名单要保护的省委书记之一。（《陈丕显回忆录》：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主席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而这个时候，周的讲话彻底让他们绝望了。几位老师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之所以会发生在这之后不久，阎红彦之死是原因之一，当时谭震林就说“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据另外版本谭震林中间还有一句“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四十年的老革命……”）

文革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就是领导人的讲话往往是全文记录，然后流传出来，全国各地翻印，无论这个讲话多么口语化。这也许是出于当时人的谨慎，害怕被别人说成是断章取义，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也正是这样的现象，让现在的人可以认清一些人的真面目。周恩来多年来人们称为“敬爱的周总理”，而几十年来“总理”一词也为他一人所垄断，即使在今天，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提到“总理”，还是指的是他。文革结束后，人们总说“总理”在文革中多么的忍辱负重，保护了多少人，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但这些流传下来的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却告

诉我们，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如这次的讲话，即使对待一位已经死去的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他也没有留下一点口德。在关于四川问题的《三一五讲话》中（1968年）他更是不遗余力的推动四川的文革，把矛头直接对准四川省原省委书记李井泉。周恩来的这样的讲话还有很多，这些讲话是绝对不会收入到他的文集里的，但是，这些讲话是可以成为研究周恩来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一些证明材料，同时也可以成为研究文革史的一个重要资源。

□ 原载《共识网》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